

主動對接「十五五」規劃 開創高質量發展新局



國家主席習近平日前在中南海瀛台會見來京述職的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充分肯定其帶領特區政府一年來「勇於擔當、積極進取」的工作成效。習主席指出，中共二十屆四中全會對「十五五」時期國家經濟社會發展作出戰略擘畫，強調要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針，促進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特別行政區政府要主動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堅持和完善行政主導，扎實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深度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此番講話不僅為香港未來五年乃至更長遠的發展指明方向，也賦予特區政府更高層次的歷史使命與責任擔當。

邵家輝 立法會議員 自由黨主席

站在國家發展全局的高度審視，「十五五」規劃不僅是內地經濟社會轉型升級的關鍵藍圖，更是香港發揮「一國兩制」制度優勢、實現自身突破性躍升的重大機遇期。作為國家唯一實行普通法，具備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地位的特別行政區，香港在國家「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橋樑與節點功能。尤其在全球地緣政治變局加劇、外部環境不確定性上升之際，香港更需緊扣國家戰略，以制度優勢轉化為發展動能，在穩中求進中開拓新局。

化為具體施政行動 落實至產業層面

特區政府已於12月17日正式啟動2026/27年度財政預算案公眾諮詢。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明確表示，明年是國家「十五五」規劃開局之年，預算案將聚焦如何擴大經濟發展面向、加快創科培育、優化產業結構，並讓增長成果更廣泛惠及市民。這釋放出一個清晰信號：特區政府正積極將中央戰略部署轉化為具體施政行動。而要真正實現「主動對接」，不僅需要宏觀政策引導，更需細緻落實到各產業層面。

作為香港傳統支柱產業之一，批發及零售業既是就業的重要載體，也是連接內外市場的關鍵樞紐，批發零售業應把握「雙循環」機遇。

面對全球供應鏈重組與數字經濟浪潮，該行業亟需借力國家「十五五」規劃建議所強調的「高水平對外開放」與「數字中國」建設，加速數字化轉型，拓展內銷與跨境電商渠道。特區政府應在即將發表的財政預算案中，針對中小企數字升級、綠色物流基建、大灣區消費聯動等領域推出精準支援措施，鼓勵業界把握對內對外「雙循環」機遇，從「通道經濟」邁向「價值創造」。

500家創科企業計劃落戶香港

特區政府近年除了積極推動北部都會區建設、成立人工智能研發院外，截至10月底已有近500家創科企業計劃落戶或擴展在港業務，顯示香港作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的吸引力正不斷提升。這與「十五五」規劃建議中強調的、在「十五五」時期基本形成「教育科技人才一體發展格局」的要求高度契合。未來，香港應進一步打通產學研用鏈條，推動科研成果產業化，並與深圳、廣州等大灣區內地城市形成創新生態圈，共同打造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高地。

「十五五」規劃為香港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戰略機遇窗口。特區政府須以更高站位、更強擔當，將「一國兩制」制度紅利轉化為發展實效，書寫「一國兩制」實踐新篇章。

黎智英案訴訟程序合法公正

熊秋紅 中國政法大學訴訟法學研究院院長、教授

12月15日，香港特區高等法院原訟法庭裁定黎智英兩項「串謀勾結外部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及一項「串謀發布煽動刊物罪」罪名成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法治的基本原則之一，它意味着：在刑事訴訟中，被告人的待遇不會因案件的性質，被告人的身份、職業、政治理念，案件的背景等而存在差異。黎智英案的審理即是如此，香港執法司法機構嚴格依法辦案，保障了法律的平等適用。

黎案審理遵守平等適用原則

首先，對於黎智英案，香港律政司依法獨立作出了檢控決定，考量因素主要包括兩方面：一是有充分的證據表明該案有合理的機會達至定罪；二是提出起訴合乎公眾利益。香港高等法院原訟法庭依據香港國安法第四十六條的規定，由3名法官組成審判庭審理該案。法官依法獨立公正地履行職責，嚴格根據證據認定案件事實，適用香港國安法和香港本地法律認定犯罪，保障被告人接受公平的審訊，其獨立性、專業性、嚴謹性、客觀性毋庸置疑。

其次，在法庭審理過程中，控辯雙方平等對抗，法官居中裁判，彰顯了法庭審判的公正性。控方列舉了大量證據以證明被告人所涉危害國安罪名成立，辯方對此進行了辯解和反駁，控方又針對辯方的辯解和反駁進行了再反駁。在庭審過程中，對每一名控方證人均進行了深入盤問。在該案中，第一被告人黎智英放棄行使沉默權，選擇作供為自己辯護，控方大量舉例證明黎智英的供詞不可靠、不可信，不應為法庭所採納。控辯雙方通過舉證、質證與辯論，理順了證據邏輯，澄清了案件事實，法庭對於證據進行了評估，因此裁定指控罪名成立。

最後，在該案的整個訴訟過程中，被告人受到了一視同仁的對待。黎智英案是香港執法司法機構所辦理的二百多宗涉香港國安法的案件之一，該案的證據採信、事實認定、法律適用以及對國家安全與公民權利自由關係的處理，與其他國安案件的辦理具有一致性，均嚴格遵守了香港國安法所規定的法治和人權保障原則。

依法保障被告人各項訴訟權利

在黎智英案中，被告人的各項訴訟權利得到了保障和落實。

第一，被告人獲得律師幫助的權利得到了充分的保障。在被告人的訴訟權利體系中，最為重要的是獲得律師幫助的權利。在黎智英案的審訊過程中，第一被告人黎智英的代表律師團隊由多名律師組成，其中香港資深大律師彭耀鴻擔任主要辯護人，多位本地律師作為團隊成員；具有香港全面執業資格的新西蘭籍御用大律師馬克·科萊特（Marc Corlett）也作為團隊成員參與了案件的辯護工作。第二至第四被告則由另外三名律師作為代表。

第二，法庭對該案進行了公開審理，將審判過程置於公眾的監督之下。根據香港國安法第四十一條的規定，「審判應當公開進行。因為涉及國家秘密、公共秩序等情形不宜公開審理的，禁止新聞界和公眾旁聽全部或者一部分審理程序，但判決結果應當一律公開宣布。」儘管黎智英案的性質涉及干犯「串謀勾結外部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但法庭還是進行了公開審訊，允許新聞界和公眾進入法庭旁聽審判。同時，為了維護法庭秩序，保障案件審理不受外界干擾，對於旁聽者的行為進行了規範。

第三，保障被告人各項訴訟權利得以充分行使。該案從第一被告人黎智英2020年8月10日被警務處國安處拘捕，直至2025年12月15日宣判，歷時五年多，其中的重要原因在於對於程序性爭議問題的處理。例如，在結案陳詞階段，辯方以第一被告人黎智英有心悸等健康狀況為由申請結案陳詞期間不出庭。在此情況下，懲教院所的醫療團隊為黎智英做了多項檢測，未發現異常。法庭認為，結案陳詞是法庭聆訊的一部分，黎智英應該出庭，同時，關注黎智英的身體健康狀況，允許其佩戴可攜式心臟監測儀出庭，並且特意在上下午分別安排了一節小休。在該案處理過程中，案件是否需要進一步調查、被告人是否需要時間徵詢法律意見以考慮答辯、辯方是否需要翻譯文件、辯方是否按照法律賦予的權利提出需要在審訊前先處理相關的申請，這些都是法庭在確定「合理的受審期間」時的重要考量因素。對於辯方的所有申請，法庭均依照法定的正常程序予以辦理。在法庭上，被告方律師充分行使了辯護權，第一被告人黎智英也進行了自我辯護。

第四，在訴訟過程中，保障被告人獲得人道的對待。第一被告人黎智英被羈押期間，懲教院所為其提供了安全、人道、合適和健康的羈管環境。懲教院所每日都安排了醫療檢查，由具有專業資格的醫生和護士為黎智英提供醫療服務，其中包括由醫生檢查心臟。這些都是懲教院所標準的醫療服務程序。當被羈押者有任何身體不適或醫療需要，都會盡快安排醫生。如果其拒絕配合醫生的建議接受相關醫療服務，懲教院所無法強制執行。如果被羈押者拒絕醫療建議，醫護人員通常會採取勸導方式，但最終仍然需要尊重被羈押者的意願。在黎智英案中，第一被告人黎智英佩戴可攜式心臟監測儀出庭受審，尊重了黎智英的意願。

黎智英案中，程序嚴格合法合規、公平公正，充分體現了香港司法體系的獨立性和專業性。證據確鑿、邏輯嚴密，即便面對複雜的外部勢力和反中亂港分子的抹黑攻擊，法庭依然堅守法治原則，拒絕任何外部干預。這不僅是對被告人權利的保障，更是對國家安全的維護，彰顯了香港國安法在實踐中的有效性和公正性。

香港加強與海南自貿港聯動 合作共贏

梁海明 海南大學「一帶一路」研究院院長 絲路智谷研究院院長



今日，海南自貿港正式啟動全島封關運作，這一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舉措由國家主席習近平親自謀劃、親自部署、親自推動；習主席多次親臨海南並發表重要講話，為海南自貿港的發展指明了前進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這標誌着海南自貿港建設邁入新階段，同時也展現中國高水平對外開放戰略取得的重大進展。在「十五五」時期，面對複雜多變的國際形勢，香港若能抓住海南自貿港封關運作的契機，充分發揮自身優勢，在現代服務業、金融、產業園區、醫療和高等教育等領域加強與海南的聯動合作，將實現優勢互補，並在服務國家對外開放和高質量發展大局中發揮積極作用。

海南自貿港封關運作後，在制度和政策層面將帶來一系列深刻變革。首先，「一線放開、二線管住、島內自由」的制度安排，將構建起全新的開放格局。其次，在政策層面，海南自貿港的「零關稅」政策將擴展至6,600個稅目，覆蓋生產設備和原材料等主要商品類別，降低企業運營成本，釋放產業發展潛力。此外，海南還通過提升「低稅率、簡稅制」等稅收優惠，進一步激發市場主體活力，為全國探索自由貿易港建設積累可複製、可推廣的經驗。

業態向專業化高端化延伸

在現代服務業發展方面，海南自貿港將大力推進生產性服務業向專業化和價值鏈高端延伸，並着力培育離岸貿易、綠色貿易等新型業態。同時，海南將生活性服務業從傳統旅遊延伸至醫療、教育、文體等多領域，打造多樣化、便利化的服務消費體系。這為香港提供了廣闊的合作空間。香港可通過向海南自貿港輸出在專業服務、數字經濟、物流管理等領域的成熟經驗，助力海南提升經濟循環效率。同時，香港企業可借助海南自貿港的政策優惠和區位優勢，拓展自身在東南亞市場的服務半徑，實現「香港模式」與「海南樣板」的深度融合。

在金融服務實體經濟方面，海南自貿港將構建與高水平開放相適應的自由貿易港金融體系，打造成為區域性金融開放的門戶樞紐。海南自貿港的金融開放舉措包括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完善EF賬戶功能、發展跨境資金集中運營中心、探索離岸人民幣業務等。同時，海南自貿港還將發展熱帶農業金融、旅遊金融及藍色金融等特色業務，提升金融對實體經濟的支撐作用。在這一領域，香港可深化與海南的合作，例如在跨境資金管理、離岸業務拓展、金融科技創新等方面提供經驗支持。

海南自貿港的產業園區建設也為兩地聯動

發展提供了重要平台。海南自貿港將通過優化園區布局、聚焦核心功能和主導產業，提升園區的集約化發展水平，並推動園區與物流、交通樞紐的直連直通。同時，海南自貿港還將推進園區產城融合發展，打造宜居宜業的現代化產業園區。擁有科學園和數碼港兩大國際知名產業園區的香港，具有豐富的專業服務和國際化管理經驗，可幫助海南自貿港提升園區的運營效能，實現市場化、專業化管理目標。兩地還可通過共建園區項目，吸引更多國際企業入駐，推動技術研發、產業升級和人才培養的全面協同。

醫療教育配套合作完善

在推動「享全球醫療」方面，海南自貿港以博鰲樂城國際醫療旅遊先行區為核心，致力於打造世界一流的國際醫療旅遊目的地和醫療科技創新平台。通過引進國際創新藥械、保健食品及特醫食品，並強化真實世界臨床數據應用，海南正逐步形成以醫療服務、康養旅遊和醫療科技創新為特色的多元化發展格局。這一戰略目標與香港在醫療技術、國際化服務及保險行業中的優勢高度契合，為兩地深化合作提供了廣闊空間。香港可憑藉其先進的醫療技術、國際化服務及成熟的保險市場優勢，協助海南引進國際創新藥械，並深化真實世界臨床數據應用，提升藥械研發與成果轉化效率。同時，香港保險公司可與海南合作拓展跨境醫療保險結算範圍，創新「醫、旅、居」多業態融合模式，共同打造世界一流的國際醫療旅遊目的地與醫療科技創新平台。

在高等教育與國際教育合作方面，海南自貿港正加快建設國際教育創新島，通過引進境外高水平大學和職業院校，打造國際教育示範區。例如，陵水黎安國際教育創新試驗區正成為海南吸引全球頂尖教育資源的重點平台，並通過「留學海南」品牌推動教育開放。香港的高校可借助海南的教育平台，在海南自貿港設立分校園或建立研究院，以此擴展在內地的影響力，並吸引更多國際學生來港來瓊學習。同時，香港與海南還可在教育資源共享、科研合作、人才交流等方面加強聯動，共同服務「一帶一路」倡議框架下的教育合作。

總結而言，海南自貿港的封關運作為香港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合作機遇。作為我國深化改革開放的重要實踐，海南自貿港通過創新驅動和政策支持，為我國探索自由貿易港建設提供了新樣本。而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和專業服務高地，則可憑藉其國際化優勢，在海南自貿港建設中發揮關鍵作用。兩地通過優勢互補、聯動發展，不僅可共同推動中國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還可在全球化競爭中實現共贏。

福建「細菌戰」再揭日寇侵略罪行

吳煒

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由於日本新任首相高市早苗早前接連發表涉台謬論及為軍國主義招魂的錯誤言論，引發國際社會和中國民眾的強烈不滿，因此今年公祭日得到更廣泛的關注。筆者想起家中老人說過，爺爺的英年早逝是因為感染鼠疫，後來隱約透露這場鼠疫並不是自然發生的，而是與侵華日軍密切相關，便着手尋找了些史料，從而揭開這段幾乎要淡化在歷史時空中的日寇罪行。

抗日戰爭時期，福建省大部仍然在國民黨政府的管轄中，但因戰略位置重要，日寇為切斷中國沿海補給線、封鎖東南口岸並準備太平洋戰爭，多次入侵福建沿海地區。1937年10月，日軍佔領金門島，1938年5月，佔領廈門全島。為規避日軍威脅，國民黨福建省政府於1938年遷往永安縣。1941年4月，日軍第一次佔領福州並控制周邊縣域，包括長樂、閩侯等，但在中國軍民抵抗下於9月撤離。三年之後的1944年10月，日軍第二次佔領福州，直至1945年8月戰敗投降。在戰爭的相持階段，為了摧毀福建人民的抵抗意志，從1942年起日寇實施了滅絕人性的細菌戰。

細菌實驗慘無人道

侵華日軍細菌戰部隊，最臭名昭著的隸屬關東軍的滿字（註：日本陸軍編號的兵團文字符）731部隊，同樣隸屬的還有滿字100部隊和滿字516部隊。此外，隸屬華北方面軍的甲字1855部隊、隸屬華中派遣軍的榮字1644部隊，以及隸屬華南方面軍的波字8604部隊，均在中國犯下了累累罪行。而對福建實施的細菌戰，主要由本部在南京的1644部隊和本部在廣州的8604部隊執行。

日寇在福建進行的細菌戰，是與浙江、江

西、廣東、湖南四省一體進行的、播撒的病原體，以鼠疫（特別是淋巴腺鼠疫）為主，也包括霍亂、傷寒、瘧疾等病菌。播撒的途徑，一是通過飛機投放，抗戰期間，日軍對福建49個縣進行了轟炸，其中包括了低空飛行投放細菌粉末、感染穀物或顆粒等，1942年福州鼠疫大爆發即源於這種方式。二是通過難民和人口流動傳播，1942年浙贛戰役後難民湧入浦城，並一路擴散至建甌、南平等地。三是通過特務投毒和走私感染鼠。四是進行水源和環境污染，導致治主要河流如閩江、富屯溪傳播。最終福建染疫範圍波及福州、莆田、泉州、廈門等主要地區，影響一直持續至1946年。

收集罪證 打蛇七寸

日寇發動的細菌戰給福建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災難，據國民黨政府衛生防疫部1948年的統計：1939年至1948年全國共有17省發生鼠疫，患者共38,296人，死亡22,298人，而福建一省就有鼠疫患者18,686人，死亡11,275人，均為國內最高，是日本侵華戰爭期間鼠疫發生最嚴重的省份。如果計及戰後影響，據中國醫學科學院流行病學微生物研究所的統計數據，因日軍細菌戰鼠疫死亡人數最終高達59,842人，導致各地尤其是福州人口銳減。

日寇在福建針對平民發動的細菌戰，是其侵華戰爭史又一鐵證如山、不容抵賴的反人類罪行，揭露了日本當年鼓吹「大東亞共榮圈」的欺騙嘴臉，也是對那些盲目留戀日治時期由福建遷往台灣地區的「台獨」分子的嘲諷。在新的歷史時期，面對日本妄圖復辟軍國主義，我們一定要認真深度研究日本各方面要素（自然地理、人口素質、社會制度），收集其歷史罪證，從而從根本上抓住「七寸」，在未來的鬥爭中佔據主動地位。